

党建引领:新时代基层公共文化建设的 政治逻辑、实现机制与新型空间*

唐亚林 刘 伟

[摘要]当代中国基层公共文化建设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展开的,具体表现为以党建引领基层公共文化建设和,这也构成了基层公共文化建设的政治逻辑。在回顾和反思现有公共物品(服务)、公民文化权利、文化治理三种视角基础上,党建引领视角下基层公共文化建设和有五大实现机制,即党建精神注入机制、组织嵌入机制、阵地拓展机制、平台协商机制、政策激励机制。上海闵行区的生动实践,全面展示了党建引领基层公共文化建设和实现机制的应用场景和操作过程。

[关键词]党建引领;基层公共文化建设和;理论内涵;实现机制

[中图分类号] D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8273(2018)06-0021-07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1](p.41)]这一论断回答了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工作的总体方向和发展思路。

作为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中国共产党在基层引领和践行先进文化、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需要采用什么战略,运用什么手段,通过何种途径,并且在此过程中,基层党建究竟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其实现机制是什么,未来发展空间在哪里等,这些问题亟待人们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并作出系统回答。

一、基层公共文化建设的三种理论 视角及其反思

目前关于基层公共文化建设和的研究文献,主

要遵循三种比较流行的理论视角:公共物品(服务)视角、公民文化权利视角、文化治理视角。

(一)理论视角

一是公共物品(服务)视角。该视角将基层公共文化建设和视为政府提供文化性公共物品或服务的过程。这种理论视角的现实关怀是寻找最有利的文化物品提供方式。为此,相关文献特别关注基层公共文化物品的提供主体与提供路径,试图在比较中确立好的文化物品供给方案。在这种视角下,普遍性的研究结论是搭建“政府为主导,企业、非政府组织、社区等社会各方共同参与,协商和对话的‘交互理性’的制度框架”,^[2]建立包括“权威型供给”“商业型供给”和“志愿型供给”等在内的多元化供给模式。^[3]

二是公民文化权利视角。该视角强调公民文化权利具有与公民政治权利、经济权利、社会权利同等重要的意义,认为基层公共文化建设和要以实现公民文化权利为依归。如有学者认为,“要明确以居民文化权利实现为宗旨和以落实社会公平正义为实质开展社区文化建设”,^[4]“实现公民文化权利是推动城市文化建设的一个重大命题”。^[5]同时,破解公民文化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包容性公民文化权利视角下统筹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新格局研究”[12&ZD021]的阶段

性成果。

作者:唐亚林,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刘伟,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行政管理博士生。

权利的具体内容,如将文化权利分解为“享受文化成果的权利、参与文化活动的权利、进行文化创造的权利、文化成果受到保护的權利”。^[6]这些文献回答了应当从哪些方面推动基层公共文化建设的問題。此外,文化权利视角与法律保障视角是相通的,它呼吁在推动公民文化权利实践中引入宪法和其他法律法规的保护,从而“保障文化权利的实现,真正做到有法可依”。^[7]

三是文化治理视角。该视角是在反思文化权利视角的基础上形成的。其中,有学者详细分析了“文化福利”或“文化权利”视角的不足:“作为文化福利的公共文化服务,往往缺失民众必要的民主参与,导致公共文化服务与民众公共文化需求相脱节;在当下,‘权利’往往被人工具性使用,如果没有一定的公共意识和公共精神的规约,又会成为一种公共性的消解力量。”^[8]为此,要“把治理引入公共文化服务”。^[8]有学者则认为“文化治理作为现代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始全面嵌入并引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改革开放40年来,“由‘发展才是硬道理’所建构的当代中国国家现代化发展模式,塑造了文化发展服务于经济发展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尴尬角色与夹缝命运,而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发展战略的确立,推动了文化发展从‘失位’向‘复位’的回归,并推动了文化治理从‘搭台逻辑’向‘阵地逻辑’的转型”。^[9]此后,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使用文化治理视角来研究公共文化建設。总体而言,文化治理视角跳出了就文化服务谈文化服务的框架,它将注意力转向政府自身治理结构转变、多元主体合作治理、政府与民众关系重构、基于引导与教育的文化治理等新型研究主题,从而打开了更多的研究空间。

(二)理论反思

基层公共文化建设的三种理论视角为我们理解基层公共文化建设的主体及相互关系、价值导向与实践路径提供了帮助。但是,仅透过这三种理论视角,我们很难理解领导一切的中国共产党的基层公共文化建设的定位,以及此过程中的自我呈现方式与行动策略,因而很难真正揭示当代中国基层公共文化建设的实践逻辑及本质特征。

事实上,执政党非常重视在基层公共文化建設中彰显自己的存在,试图引领基层公共文

化建设。比如,“政府在公共文化服务中坚持意识形态前置,强化公众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是其在公共文化服务中的政治逻辑”。^[10]此外,从认识上看,领导一切的执政党坚信“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倾向于把基层社会中出现的问题,包括基层公共文化建設方面的问题,归结为基层党建的弱化。因而在实践中,执政党通常会將基层党建与基层公共文化建設结合在一起。

总之,我们无法脱离执政党来抽象地谈论基层公共文化建設,而必须在理论建构上找回被忽视的“执政党角色”这一核心要素。对此,笔者以“党建引领”为理论视角,从执政党在基层社会呈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引领和践行先进文化、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角度出发,探讨新时代中国基层公共文化建设的理论内涵及其实现机制。

二、党建引领基层公共文化建设的政治逻辑与实现机制

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新时代基层公共文化建設承担着满足人民群众文化需要和呈现中国先进文化(由执政党代表)的双重使命。为实现这一双重使命,中国共产党必须依赖于党建对基层公共文化建设的引领,这也构成了执政党推进基层公共文化建设的政治逻辑。在既定语境下,党建引领的核心机制是党建精神引领,其外围实现机制则包括组织嵌入、阵地拓展、平台协商、政策激励等,而外围机制中的组织嵌入与阵地拓展机制主要解决基层公共文化建設方向不明问题,平台协商与政策激励机制主要解决建设动力不足问题。

(一)党建引领基层公共文化建设的政治逻辑

当代中国的基层公共文化建設绝不是仅向公民提供文化物品,也不是简单的政府治理行为。按照邓小平的观点,“文化工作服从于政治任务……各种势力的文化工作都是与其政治任务密切联系着的,所谓超政治的文化是不存在的”。^{[11](p.22)}第一重使命就是组织基层公共文化物品与服务的生产,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兑现“为人民服务”“代表中

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政治承诺,进而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基础。第二重使命是在这一过程中,呈现执政党对先进文化的代表权和对文化发展的领导权,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并为执政党带领中国人民走向文化自信奠定基础。

为顺利实现上述使命,执政党必须加强对基层公共文化建设的领导,具体表现为以(基层)党建来引领基层公共文化建设的政治逻辑。“引领”与“领导”相似,在内涵上是相通的:以党的建设引领基层公共文化建设的政治逻辑,是执行和加强共产党对基层公共文化建设工作领导的一种重要方式。实质上,党建引领是把执政党关于文化建设的路线、方针与政策贯彻到基层公共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尽管也包含着直接建设或干预的部分,如执政党通过行政机关向落后地区直接提供文化公共物品,但是“引领”不等于执政党直接建设或干预,它超越直接建设或干预的内涵。

一言以蔽之,党建引领是指执政党通过加强基层党建,积极和有效地发挥基层党组织和党员队伍的作用,保证基层公共文化建设的方向正确、动力提升。其中,动力提升意味着建设速度与建设水平的提升。如果把基层公共文化建设的比喻为朝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道路前进的过程,那么,党建引领的功能或意义则体现在保证方向和提升动力两个方面:第一,为基层公共文化建设的指明正确方向,防止基层公共文化建设的走上歪路与邪路。第二,综合运用多种手段,为相关主体朝着正确方向前进提供充足动力,并把多方力量整合在一起,提高向前迈进的速度,提升基层公共文化建设的整体水平。在此意义上,保证方向和提升动力是党建引领基层公共文化建设的功能合理性所在。

党建引领基层公共文化建设的政治逻辑又通过三个途径来展现:一是文化体制创新。新时代,多层次、个性化的文化需要已经成为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组成部分,单靠国家来“办文化”,已经无法满足人民群众的多样化需要。此时,应当在文化体制上创新,在以党建引领确保文化发展方向的基础上,通过体制创新来激发更多的主体参与,推动基层公共文化的发展与繁荣。二是文化标准(规范)引导。改革开放

以来,全球化及市场经济发展推动了中国社会的文化变迁,也给中国的文化发展带来很多挑战。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新旧文化之间必然发生一系列交织和碰撞,此时,为保证文化前进方向不出错,“必然需要相应的社会宏观调控,制定出有效的文化规范加以引导”。^[12]三是文化物品直供。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背景下,发达城市地区民众的公共文化需要已经上升到较高水准,而许多边远农村地区的公共文化水平较低,且短期内很难通过市场或志愿路径得以解决。这就需要执政党及政府以集中、自上而下、快速的方式,向这些发展不充分的地区直接提供(配送)基层公共文化物品,如文艺演出、培训讲座、公益电影等。这也构成党建引领基层公共文化建设的项内容。

(二)党建引领基层公共文化建设的实现机制

党的十九大报告对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以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为主线,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坚定理想信念宗旨为根基,以调动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着力点,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13](pp.61-62)

现实中,党建引领要通过一些载体来实现,这些载体可能是党的宣传、党的组织、党的成员及人才队伍、党的文化阵地(如各类活动中心)、党建平台、党建项目、党的政策等。在这方面,已有一些研究分析了党建引领的具体实现机制。如有学者认为执政党调用了组织嵌入、体制吸纳和价值引领等策略(分别对应执政党的组织、统战和宣传职能)来重新整合基层社会,其中价值引领是指“执政党以自身推崇的价值标准引导群众的价值判断,以期形成社会的价值共识,进而动员整合社会朝着执政目标努力的行动”。^[13]有学者认为,在基层治理中,党建引领主要包括平台引领(如社区代表大会、区域化大党建、党建服务中心)、主体引领(“两代表一委员”、党员)、机制引领(协

商民主)、行动引领(党建项目)等策略。^[14]还有学者指出,应当实现党建由“组织引领”向“功能引领”的转变,“功能引领强调动态的过程党建,替换组织引领中的静态党建做法,具体有四个方面:政治功能引领、整合性引领、动员功能引领、沟通功能引领”。^[15]

结合新时代党建要求及既有研究文献,笔者认为,可以首先把党建引领的要素分为核心层要素和外围层要素。核心层要素是党建精神或政党文化,如基于“全党服从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精神、“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尽职、为民造福”的政治担当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共产党人使命精神。外围层要素则包括党的基层组织、党员干部队伍、党的阵地、党建平台、党建项目、党的政策等。

综合而言,党建引领的实现机制包括党建精神注入机制、组织嵌入机制、阵地拓展机制、平台协商机制、政策激励机制等,如图1所示。

党建精神注入机制是指通过宣传、教育、纪律等方式,在基层公共文化建设的进程中注入集中统一领导精神、政治担当精神、共产党人使命精神等。这里的党建精神类似政党精神或“政党文化”。^①组织嵌入机制主要是指在承担基层公共文化建设的市场或社会主体中建立党的组织,还包括将优秀党员充实到基层公共文化一线。阵地拓展机制是指依托各类有形的党建活动中心、社区文体中心等,不断增强这些有形阵地的服务与吸引能力,从而将党的公共文化阵地向外拓展。平台协商机制是指利用党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优势,搭建由党的组织、政府部门、事业单位、“两新”组织、社区组织、居民等主体共同参与和共同协商的平台,如区域化党建平台,保证基层公共文化建设和相关

决策与实施方案切合各方需求,能够调动各方积极性。政策激励机制是指通过资金扶持、政策优惠、奖励、政府购买服务等多种方式激励市场与社会主体参与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政策激励机制的一种重要形式是项目资金撬动,即聚焦群众关心的公共文化建设议题设立资金项目,政府按照一定比例对中标项目加以扶持,借以撬动社会资金来参与公共文化建设。

其中,党建精神注入机制起着根本性作用,脱离了这一点,其他机制难以发挥作用和取得实效,无法承担起执政党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文化需要和呈现中国先进文化的使命。在党建精神注入机制的统领下,组织嵌入机制、阵地拓展机制主要是为了解决基层公共文化方向不明的问题。平台协商机制、政策激励机制则是为了解决建设动力不足(往往由主体单一造成)以及由此带来的建设速度太慢、建设水平过低等问题。

三、党建引领基层公共文化建设的生动实践:基于上海闵行区的个案分析

闵行区位于上海地域腹部,区域面积近372.56平方公里,现有9个镇、4个街道、1个市级工业区。截至2016年底,全区常住人口总数为253.98万人,其中外来常住人口127.04万人,是典型的人口大区。GDP在上海17个区里排名第三,但是人均GDP仅排名第十一。由于人均GDP相对落后,而人民群众公共文化需求规模庞大,闵行区长期受困于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设施落后、服务资源不足、服务能力不强、城乡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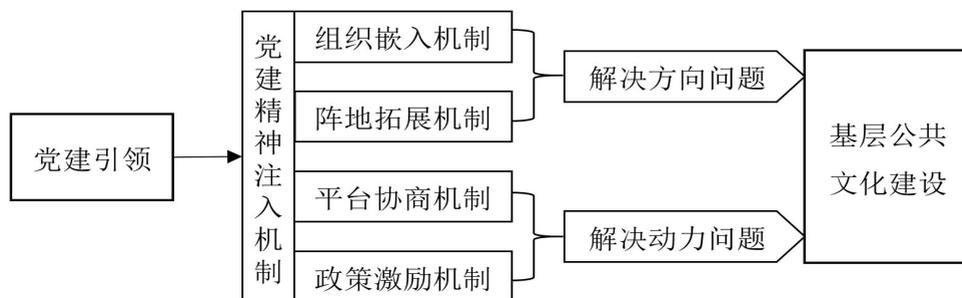


图1 党建引领基层公共文化建设的实现机制及过程

^①“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包含着先进的政党意识、科学的制度规范和执政理念及执政方式、良好的政党形象,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典范。它不仅是凝聚人心、整合社会资源的重要力量,也是引领社会文化发展潮流的有效工具。”参见桑玉成、李冉:《政党文化与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研究》,《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6年第1期。

务供给不均等现实问题。当然,闵行区也有它独特的优势,如地理优势逐渐显现,经济发展速度快,拥有许多优秀的传统文化元素等。2012年以来,闵行区确立并逐步推进“党建引领”的文化建设战略,取得了明显的成效。这一切有赖于闵行区对党建精神注入、组织嵌入、阵地拓展、平台协商、政策激励等机制的综合运用。

(一)重视将党建精神注入基层公共文化建设实践

闵行区在推动基层公共文化建设和时,非常重视将党建精神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注入其中。在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发布之后,中共闵行区委就制定和出台了《关于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推动闵行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实施意见》(闵委发〔2012〕9号),确立了“党建引领、群众主体、政府支持、社会参与”的文化建设战略。为加强集中统一领导和统筹协调,还在区级层面组建“一园一区建设领导小组”“区文创产业推进领导小组”“区公共文化服务协调小组”等小组。2016年以来,中共闵行区委明确将“党建引领下的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作为年度重点工作,进一步加强党建对基层公共文化建设的引领作用。

闵行区运用党建精神注入机制的一个突出表现是,按照习近平“使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无时不有”^{[16](p.165)}的要求,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注入基层公共文化建设的整个流程中。例如,依照《闵行区文化改革与发展“十三五”规划》,推动传统文化进校园,开展“我们的节日”主题实践活动,定期组织全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和核心价值观教育实践成果集中展示;开展“好家风好家训”系列活动,将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结合起来,并融入群众的日常文化活动中。

(二)借助“双报到、双报告”“政治指导员”制度等实现组织嵌入

闵行区在组织嵌入方面最典型的做法是建立驻区单位党组织和党员“双报到、双报告”制度。按照中共闵行区委组织部2015年发布的《闵行区关于做好驻区单位党组织和党员

①2016年10月17日,闵行区H镇文体中心访谈记录。

“双报到、双报告”工作的通知》,“双报到”制度,即驻区单位党组织到社区党组织报到、党的组织关系不在现居住地的党员到现居住地党组织报到;“双报告”制度,即驻区单位社会责任报告和党员参与社区活动报告。“双报到、双报告”制度抓住了党组织和党员这一基层党建的核心主体,一方面,有利于将执政党的意志贯彻到基层公共文化建设和中,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推动驻区单位参与基层公共文化建设和、党员参与社区公共文化活动和,从而为发展和繁荣基层公共文化创造更多可能。

闵行区抓组织嵌入的另一个具体做法是在群众文化团队中设置党组织。对于那些无法直接设置党组织的,有些地方(如闵行区H镇)则尝试设置“政治指导员”制度。H镇的一位干部在接受访谈时提到:“这些(群众文化)团队最开始是备案,在基层做得好了以后就可以注册了,纳入我们的视野和平台,就会有扶持。我们是从2012年开始,到2013年的时候我们就提出了党建引领。因为很多做得很好的团队领导人不是党员,当时我们想的办法就是在20个重点团队里面设立一个政治指导员。不建立党小组的原因就在于避免组织混乱。这个制度在2014年、2015年实行得还不错。”^①通过这种方式,闵行区尝试对群众团队进行必要的引导,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群众性文化活动和中的影响力,从而推动基层群众创作热情和党建精神的融合。

(三)不断建成、拓展和推出党建引领下的公共文化阵地方阵

党建引领的政治逻辑要求执政党在基层要有自己的文化阵地,且基层文化工作队伍要有“阵地意识”。2016年10月,笔者在调研闵行区M镇党建服务中心时,一位工作人员讲述了他们所理解的阵地意识:“我们是镇党委领导下的一个事业单位,我们要和社会上的社会组织、企业等区别开来。如果和社会上做的是同样的话,那么我们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所以为什么要存在这样一个事业单位,那就是(因为)我们是党建引领下的,要有自己的一个使命感,我们就是要凝聚人心的。我们这些年来一直在避免为了活动而活动,这些都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我们着重把满足群众的文化需求作为重点工作……除了凝聚人心的作用外,还有就是满

足他们的文化精神需求,再有就是,人的思想我们不去占领就会有其他思想去占领……我们的服务人群一定是广大人民群众,我们不是为少数人服务,而是为大多数人服务的。”^①

阵地拓展机制的前提是建立有形的基层公共文化载体(包括基础设施体系),如党建服务中心、社区文化活动中心(文化馆、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文化广场等。闵行区把基础设施体系建设作为基层公共文化阵地建设的主要内容,着力布局区、街镇、社区等多层次的文化服务网点。《闵行区文化改革与发展“十三五”规划》的数据显示,仅在“十二五”时期,闵行区就建成了闵行区群众艺术馆新馆、闵行区博物馆新馆,完成100个市民文化广场标准化改造;镇级层面建成颛桥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闵行区民间美术馆(颛桥)、老闵行历史文化陈列馆(江川)、俞塘民众教育馆(马桥)、吴泾人文历史陈列馆、上海漆器馆(华漕)、秦怡艺术馆(浦江)、昌硕文化中心(新虹)等。社区文化活动中心标准化达标率实现100%。

阵地要活起来并真正地拓展出去,需要有足够多的文化团队和丰富的文化活动。闵行区不断培育群众文化团队,支持广场舞等群众文化活动,调动群众参与文化活动、创造文化物品的积极性。提高阵地的利用效率,为基层群众的文化活动(例如居委会组织的党员宣誓活动、读书学习活动等)提供活动空间、舞台条件等。同时,做好文化资源由城市向农村的配送,以及农村优秀文化资源向城市的传输,推动城乡间文化资源的双向交流和共同繁荣。此外,闵行区还非常注重对历史文化遗存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并把一定的精力放在挖掘和包装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发现和培育特色现代文化上,从而建立见证闵行历史、兼具闵行发展特色和现代化特征的文化品牌,发展骨干文化企业和创意文化产业,最终促进文化资源向文化资本的转化,推动文化发展良好生态的形成。

(四)利用区域化党建平台发挥群众主体作用并促成多方合作

平台协商机制的主要体现是区域化党建。闵行区构建了以区、街镇、村居区域化党建联席会议为载体的三级平台,形成了纵向贯通、

横向整合的组织架构体系,包括党的组织、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社区组织、居民等在内的主体都纳入其中。区域化党建在一定程度上支撑了群众在基层公共文化建设中的“群众主体”地位。例如,闵行区充分发挥平台联系各方的优势,帮助联系专业性文化企业与专家,对众多由群众自行组织的文化团队进行指导和包装。同时,搭建更多、更大的表演平台,如组织“跳跳舞”杯广场舞大赛,促成基层优秀文化团队竞相登台的景象。

联系企业、各类驻区单位、文化名人等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为闵行居民提供更加立体化的公共文化服务。例如,闵行区努力调动工业园区企业参与基层公共文化建设的积极性,把服务企业员工与家属和服务社区相结合,使工业园区公共文化和社区公共文化建设相融合。其中,由莘庄工业区和区内企业共同建设的“得丘礼享谷·邻里中心”,是上海市级工业园区中率先开设的特色邻里中心。该中心的宗旨是“博文知礼、同乐悦享”,主要由刘一闻大师工作室、得丘文化创意空间、得丘艺术馆、得丘道德礼院四个载体组成,涉及文化名人、创新创业、艺术熏陶、道德养成、教育培训等多个领域近30个服务项目。自2016年7月揭牌成立以来,已经开展了多场书法、展览、讲座、亲子等活动,近1000人次参与。^②

(五)设立专项扶持资金以撬动更多的文化资金投入

闵行区在基层公共文化领域实施政策激励机制的主要做法是设立专项扶持资金。从2013年起,在整合原有闵行区文化发展专项资金、闵行区文化广播电视发展基金、闵行区精神文明建设基金和上海城市剧院计提票款与政府配套资金的基础上,闵行区区级财力每年安排500万元文化发展专项资金,资金管理工作主要由区委宣传部承担。资金项目主要用于文化成果奖励、精神文明建设、战略资源合作、非常设性大型文化活动、文艺创作与推广、文化课题研究、文化人才学习培训、文化综合平台建设等。

以2015年为例,“文化发展专项资金包括文化成果奖励类25万、精神文明类70万、资源

^①2016年10月17日,闵行区M镇党建服务中心访谈记录。

^②2016年10月17日,闵行莘庄工业区调研材料。

合作类100万、文化活动类100万、文艺创作与推广类100万、课题研究类30万、人才学习培训类30万、平台建设类45万”。年度预期目标是“2015年实现实际资助项目数至少15个,同时撬动基层单位文化资金投入总金额达到600万”。^[17]

四、以“日常生活党建”全面拓展 党建引领新时代基层公共文化 建设的新型空间

通过对上海闵行区党建引领基层公共文化建设的生动实践的全方位展示和系统性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贯穿在其中的一大鲜活经验:基层公共文化建设的要想取得实效和获得居民认可,必须落到实处,必须落到居民的日常生活中,而其中的关键在于将基层党建、基层公共文化建设和服务居民日常生活三者有机结合,通过开创“日常生活党建”的新形态,全面拓展党建引领新时代基层公共文化建设的新型空间。

所谓“日常生活党建”,是指将党建工作融入党的建设、政府建设、社会建设与企业建设、工作人员与居民日常生活行为建设等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全过程,通过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的文化建设的引领,推动全社会形成人人争先、个个奋进、全体人民崇德向善的浓厚文化氛围,让党建精神扎根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全过程、渗透于社会生活各方面。

“日常生活党建”包括三个方面内容:党建工作的日常化;融党建工作于党政部门的日常性工作中;以服务群众的日常生活,满足他们的日常生活需求与解决他们的日常生活问题,为党建工作的重要价值导向。“日常生活党建”既是一种工作方法,又是一种战略理念;既是一种新型载体,又是一种新型制度;既是党建的重要内容,又超越了党建本身。“日常生活党建”是党建引领基层公共文化建设的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水平的根本支撑,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重要方法和发展战略。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党的基层组织是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的基础。要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突出政治功能,把企业、农村、机关、学校、科研院所、街道

社区、社会组织等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1]p.65}“日常生活党建”新形态,既是全面推进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的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有效突破口,又是在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公共文化需要成为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时代背景下提升基层公共文化建设的制度载体,还是全面呈现中国先进文化的新型空间,为执政党获得人民群众的认同和支持建构起长期稳定的执政基础。

[参考文献]

-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2]李少惠.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主体构成及其功能分析[J].社科纵横,2007,(2).
- [3]周晓丽,毛寿龙.论我国公共文化服务及其模式选择[J].江苏社会科学,2008,(1).
- [4]刘小流.城市社区文化建设新思考[J].理论月刊,2008,(4).
- [5]花建.实现公民文化权利——推动城市文化建设的一个重大命题[J].探索与争鸣,2006,(3).
- [6]何继良.关于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的若干问题思考[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7,(12).
- [7]莫纪宏.论文化权利的宪法保护[J].法学论坛,2012,(1).
- [8]吴理财.把治理引入公共文化服务[J].探索与争鸣,2012,(6).
- [9]唐亚林.当代中国文化治理的生成逻辑与维度建构[J].中国文化产业评论,2017,(1).
- [10]颜玉凡,叶南客.文化治理视域下的公共文化服务——基于政府的行动逻辑[J].开放时代,2016,(2).
- [11]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12]曹泳鑫.先进文化的大众化和社会动员——兼论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历程[J].现代哲学,2006,(1).
- [13]孙柏瑛,邓顺平.以执政党为核心的基层社会治理机制研究[J].教学与研究,2015,(1).
- [14]刘建军.党建引领缔造中国基层治理的政治逻辑[N].社会科学报,2016-12-29.
- [15]吴新叶.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新趋势及其应对[J].国家治理,2017,(33).
- [1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 [17]2015年闵行区文化发展专项资金项目描述[EB/OL].
http://www.shmh.gov.cn/sites/minhang/zhengwugongkai_content.aspx?CtgId=27d29a5b-d0a8-4fa6-9055-33fbb748fdeb&Infold=2a18fb9a-4c5e-4389-bf5c-d1718c0333aa.

责任编辑:涵 林

On the Historical Status and Research Scope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When it comes to the publicity of studying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we shall keep in mind that only broad horizon could appropriately define its historical status; otherwise, we could never accurately and deeply understand its profound and great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Since the great thought itself epitomizes affluent thoughts in essence, we shall have a deep and exact grip on Xi's significant thoughts with foresight and profoundness from major and broad perspectives. The thought is a comprehensive expression of thoughts concerning Chinese socialism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the leadership and governance of the CPC; the practice of socialist construction, the evolution and modernization of world histor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civilization which includes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s. (Cao Yong-xin)

Eliminating Barriers to Health and Achieving Happy Life for People: A Study of Xi Jin-ping Thoughts on Improving People's Health: Xi Jin-ping's elaboration on the issues of people's health and related rights and benefits as an abundant ideological system exhibits the CPC's "people-centered" governing philosophy and embodies numerous values on human rights. Measuring against "people-centered" values, Xi Jin-ping repeatedly underscores that strengthening people's health and safeguarding their related rights and benefits are required for people's pursuit of happy and beautiful life. As for strategic policy, Xi Jin-ping also systematically dissects various barriers to people's health rights and benefits and proposes the concept of "integrating health issues into all policies". Therefore, we could firmly believe that we are sure to build up a healthy countr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modernization of a powerful socialist country under the guidance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Ma Ting and Tang Xian-xing)

On the Internal Philosophy of CPC's Leadership as the Intrinsic Characteristic for Chinese Socialism: Xi Jin-ping's crucial statement of "CPC's leadership as the intrinsic characteristic for Chinese socialism" is undoubtedly a new definition of the CPC's historical role put forward by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centered by Xi Jin-ping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The statement deepens our knowledge of the intrinsic characteristic of Chinese socialism and uncovers the essential connection between the CPC's leadership and Chinese socialism. On the basis of the organic unity of history, practice and real progress in the crucial statement,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further study and comprehend the ideological essence and rich connotations of the "most intrinsic characteristic" statement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They are three great leaps from "rising up", "bettering off", to "strengthening up", the CPC's leadership as the most outstanding institutional advantage of Chinese socialism, and the continual strengthening of Party construction. (Wu Yue-dong)

Constructing Grassroots Public Cultures in a New Era: The construction of grassroots public cultures in contemporary China has been carried out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PC and under guidance of party construction, which constitutes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grassroots public culture. In review and reflection of public goods, civil cultural rights and cultural governance, this article systematically studies five mechanisms for constructing grassroots public cultures under the guidance of party construction. They are the mechanism for essence incorporation, that for organization implantation, that for front expansion, that for platform coordination and that for policy stimulation. Also, the paper presents a survey of Minhang District in Shanghai to fully demonstrate the applicable conditions and operational process of the mechanisms for cultivating grassroots public cultures under the guidance of party construction. (Tang Ya-lin and Liu Wei)

The Implement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Cored by Rural Party Organizations: The acceleration of implemen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acts as a crucial measure for promoting rural-urban integration, constructing a well-off society in an all-rounded way, ensuring the accomplishment of the "The Two Centenary Goals" without a hitch, and facilita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urban-rural governance at presen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trategy calls for solutions to several marked issues: the fade of political ideology in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party organizations, the looseness of organizational management, administration-oriented party organizations and the marginalization of the mass line. Thus, we shall heighten the comprehensive capability and qualifications of cadres and party members in rural organizations, enforce the rally, combat, cohesive power and influence of grassroots Party organizations among the mass, and provide powerful support of ideology, politics and organization for the strategy. We shall also further harmonize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party and the masses and that between cadres and masses, consolidate the ruling basis of the Party among wide rural areas, and fully bring about the leading and core role of grassroots rural party organizations. (Li De and Yan Xin-chao)

Dis-Embedment and Re-Embedment: Reconstructing the Inclusiveness of Sub-Cultures for Chinese Adolescents in a New Age under the Guidance of Socialist Core Values: Youth subculture constitutes an essential part in social-cultural structures and is one form of important subcultures which bilaterally interacts with socialist core values as a representative of chief Chinese ideologies. As the entities of Youth subculture, adolescents emerge as an indispensable vibrant power for the great revitalization of Chinese nation and the achievement of Chinese Dream, so their constructing a healthy, ambitious outlook on world, life and values poses crucial realistic significance and values. Youth subculture in social transformation could easily be influenced by modern materialism and consumerism, excessive social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and social congestion etc. Mirroring dis-embedment with social-cultural structure, the subculture is chiefly exhibited by the escalation of rite resistance, the dissimilation of youth subculture and the rational normalization and exclusion by mainstream cultures. In view of all the positive impacts of youth subculture on remedy mechanism for general social-cultural structure, resources for social-cultural sign production and innovative vigor for chief cultures reinforcement, it is necessary to facilitate the favorable interaction between youth subculture and mainstream cultures, especially socialist core values, and re-embed youth subculture into the general social-cultural structure by reshaping a healthy social environment, purifying the Internet ecology, building up a healthy social mentality and integrating educations of diverse cultures. (Du Shi-ju and Liu Lin)

Marx's Thoughts on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Its Guidance for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Unlike the philosophy of structuralist economics and global value chain theory in the aspect of industrial upgrading, Marxist economics regards "industrial upgrading" as an internal driving force for various capitals in seek of excess profits, as well as a mobile process for cultivating and accumulating capabilities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by introducing new technologies, new modes and new methods in response to external pressure out of capitalist competition. Marxist economics holds the improvement of labor productivity as the core. The process includes the mobility of internal production pattern, that of production pattern across industries and the comovement of productivity within industries and among industries. The competition of capitals within industries and among industries, the spatial mobility of capitals and the division of capitals are the process mechanism and applicable measures for promoting industrial upgrading. Promoting industrial upgrading calls for observing the rule of production mode, especially that of technological evolution, the law of proportionately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social production, and the principle of productive labor growth effect. Only by complying with the three rules could we make industrial upgrading an effective pathway for sustainable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high qualities. (Wei Xu)

A Marxist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Production Capacity Surplus and an Analysis of Demand-Oriented Solutions: From economic perspective, the crux of production capacity surplus actually lies in the opposition between production purpose and social demand. Since the 1950s, the Chinese academic circles have opened three major discussions about the opposition. Reviewing Marx's uncovering the internal cause of the opposition between production purpose and